

读书

文从
精选

周振鹤

随无涯之旅



读书
文丛
精选

随无涯之旅

周振鹤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无涯之旅 / 周振鹤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

(读书文丛精选)

ISBN 978-7-108-05781-5

I. ①随… II. ①周…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772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81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 1 小叙
- 5 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
——以万变成其不变
- 10 当饭菜吃还是当衣服穿？
- 17 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 21 癯野老人、天游化人和中华民国遗民
- 31 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
- 46 中国历史上的禅让连续剧
- 61 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
- 75 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
- 87 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114 一个华化了的英国人
- 118 范约翰和他的《中文报刊目录》
- 124 从莫里循文库到东洋文库
- 137 书同文与广方言
- 143 书中自有富强术？
- 151 问策与对策

- 162 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
- 180 不妨读读历代正史地理志
- 194 黄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 199 一本小而有当的书
- 204 一百二十年前的两册征订书目
- 211 淘书在日本
- 216 秦始皇东巡探踪
- 226 秋冬秋冬
- 242 头朝西方的赑屃
- 246 龟兹的读法
- 249 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
- 280 释江南
- 289 地戏起源臆测
- 294 上海城市的形成
——上海建城七百周年的回顾

小 叙

收在这本小集子里的文章多半与文化有点瓜葛，但却都是在文化热早已降温，发烧友大都散尽以后写的。开头的几篇是关于文化一般的，但卑之无甚高论，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国文化只有化西的前景，绝无西化的可能。其中以《当饭菜吃还是当衣服穿？》来比况中日文化的不同，似乎不伦。其余文章则大多是谈一些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人或书或事。以人而言，如徐霞客大家都知道是明代大地理学家，但比他稍早的王士性却如吕洞宾一样，三过岳阳人不识，没有哪怕一本辞典或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提到过他，而实际上正是他和徐霞客的著作，才使中国的地理学完全脱离历史学的附庸地位，蔚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一文就是为他而写的。以书而言，那些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三不”书，是不大有人看得起的，但我觉得在这些书当中，却存在着理解文化史进程的某些东西，《书中自有富强术？》与《问策和对策》都是试图说明这种观点的。以事而言，历史事件的发生长期以来被认为有其必然性，但

是我怀疑在文化选择方面是存在着某些偶然性的，《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就是这一想法的表露。

部分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是比较有机会行千里路的。在国内，除了台湾以外，是各省市自治区都走到了，在国外，亚澳美欧也都蜻蜓点水过，但我却很少写游记之类的文字，不是别的，只因太不会写风花雪月了。收在这里的几篇准游记，一篇是国内的，一小束是澳洲与西欧的，又一篇是日本的，里头看不到他乡风光或异国情调，有的只是一些凡人琐事，我是想即使琐事也是能投射出文化差异的映象的。只有《秦始皇东巡探踪》写的是大事，目的是强调秦文化与齐文化的不同，但写得并不精彩。

对于臧否人物，我也与描写风景一样不大得心应手。好在所写的对象多有自己的专业研究作支持，不大怕说豁边。尤其是《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一文其实是在自己做了艰涩的历史地理考证以后才有的深刻体会，当然这篇文章也可以写成史学史的专门论文，但那样到底读者面就窄了。《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赞颂徐继畲的，他由于写了《瀛寰志略》一书而为当时人所不容，又由于与林则徐有过齟齬，也为现代学者所冷淡，为了说清楚他的不同凡响，文章写得长了一点。至于对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三位大人物，研究者不知凡几，有的学者更是以毕生的精力和他们周旋，自然更是不容我置喙。好在我的落脚点不在他们的辉煌时期而在他们的背时辰光，使得《瘧野老人、天游化人和中华民国遗民》尚能自圆其说。说到

人的还有三篇是与来华的“洋鬼子”有关的。近代来华的西洋人多如牛毛，挑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与中国近代文化史有点关系，但除莫里循外，其他两人从未有人提及。即便是莫里循，也很少有人详细介绍他那著名的文库，而且多半将他译为马礼逊，虽然那样译没有错，但遵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是以译为莫里循为宜的，这只要读读他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便知。

我的后青年时期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但是在专业之外，我还热衷旁门左道，譬如对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就特别有兴趣，曾与友人合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倡议建立文化语言学。因此这里也有几篇文章谈及语言接触现象以及与这一现象相关的书籍，如《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是有关洋泾浜英语的，《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是关于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读本的。其他一些文章还表现出我读书也是无特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这个缺点从几篇小书评和在日本淘书的经验是很可以看出来。但是我想，除了野狐禅外，到底还是应该写几篇与我的专业有关而又不太专门的东西，这就是介绍性的《不妨读读历代正史地理志》与这本集子里的最后两篇文字的来由。

我自小喜欢读书，能够拿到手的，什么都读。但也自小痛恨作文，能挨过一天就是一天。记得高中时代，一学期只有四五篇作文，比起现在的学生来真是如在天堂般快活，但即便如此，我也要百般拖延，非到明天交卷，便不肯动手。有一次拖到超限两天，老师虽然认为文章尚可，

也只好降一等打分。这个旧习至今依然未改。书是要读的，文章却是怕写的。怕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自己的驽钝。一篇同样篇幅的文章，别人写来只要一两天，甚至一个夜车也就出来了。我却要十天半月，吃力得很。由于吃力就产生畏惧心理，觉得那位秀才对他老婆说的“你生孩子是肚子里有，我做文章却是肚子里没有”，真是至理名言。但是怕只管怕，文章还是不能不写，尽管现在没有老师来逼我，但强人剪径却是有的，于是就不得不留下了这些买路钱。把这些文字回头再看一看，我真打心里感谢读书界新闻界的这些男女强人。几年来，要不是他们的督促鼓励，就不会有这本小集子的问世，我多半只会永远埋头于那些过于专门的学术论文之中而不能自拔。

《庄子·养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这句话当中的“知”历来有许多种解释，我权当它做“知识”解。那么这句话或可别解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却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穷的知识，真是白费心机了。且不管庄子的本意是否如此，别解的意思本身却是成立的。求知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是殆已的事。宇宙中的知识无穷无尽，一个人哪有无限的生命去对付它。但是古往今来，对知识孜孜以求者如恒河沙数，这些人未必不明白上面这个道理，只是自己心甘情愿而已。我虽不敏，也愿随前贤之后，做“殆已”之一员，故自颜小集曰：随无涯之旅。

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

——以万变成其不变

昔人常言：礼有经亦有权。权是变，经是不变。这句话或许可借用以表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走过的历程——有变有不变。

认为中国文化一成不变的看法在本世纪以前普遍存在。只是在十九世纪前，对这种不变的文化是持仰慕态度，认为这是显著优点。法国革命前，就有人赞美道，像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更迭而旧貌依然的古老帝国”，是“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国家都不禁鄙视厌弃”。但在十九世纪以后，仰慕和钦羡却一转而为批评甚至憎恶，宣称只有在欧洲，人类生活才真正具有历史，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土族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变的文化。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成不变则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死亡。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古老文明，不是已成陈迹，便是蜕为另外一种文化。唯有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既不中断亦未面目全非。这就是有变有不变的结果。有变才能发展，有不变才能维持其

本来精髓。一成不变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文化变的是什么呢？是其表层部分，亦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至精神文化，不变的则为深层的心态文化。从物质方面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席地而坐到东洋去了，我们现在只会胡坐；峨冠博带早成陈迹，我们反倒以为长袍马褂自古以来便是国服。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比谁变得都快。至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音乐舞蹈，盛唐时就既有胡琴又有胡旋舞，全都来自西域；比较深层的宗教领域，中国人也不在乎，来了佛教信佛教，来了基督信基督；死了人一班和尚一班道士，吹吹打打，没有人觉得奇怪。不像在西洋，改宗是件天大的事。

不变的又是什么呢？是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贯到底都不会变。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哪里会变？道自然也不可能变。《汉书·地理志》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尽管一变再变，但变到“道”就不再往下变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书》云：道心惟微。看来很神秘，不大容易懂。《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有几分明白了。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文化在中国都只是器。只有深层的心态文化才是道。往俗了讲，道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准则，就是对天地君亲师的信仰，就是为尊者讳为亲

者讳，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心态文化。严复从青年时代起就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中年以后名声如日中天，却始终以来未中科举为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但却照旧蓄辫子赞小脚，都不变其中国人的心态。无论是孔子捶胸顿足的礼崩乐坏，无论是李鸿章哀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道都没有变。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并非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历来的看法，恰恰相反，是以万变来成其不变，以表层的万变来维持核心的不变。

然则表层的万变又各有程度的差异：真正全变的只是物质文化，这一点早在明末就被利玛窦看出来，他说：“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说到制度文化，则只是表面的模仿而已。皇冠打掉了，专制依然；国会召开了，议员却是贿选的。精神文化也是变而不彻底，中国人因为有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所以对任何宗教都可来者不拒，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把宗教和信仰分开对待的，宗教虽可变更，信仰则永远是中国式的。所以儒家不是宗教，却比宗教更深入人心。而且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即便儒家学说这样纯属国粹的东西，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在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变成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只是不变其为儒家。

尽管中国的地理背景相对孤立，但数千年来仍然与东

西洋都有着绵绵不绝的交往。与外来文化交流就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将外来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而不是使中国文化同化于外来文化。同化的结果有时简直惊人，就俗一点的说，例如狮子舞就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舞蹈；就高深的方面说，禅宗完全是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同化的过程简直是不露痕迹。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第二特点是要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只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有容乃大”——这样说只强调容纳百川，而忽视其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变化，难怪费正清因此而产生冲击反应的思路——而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过程或者可称之为“有变乃恒”。

既然中国文化的变迁有上述两个特点，因此除了在物质层面外，中国文化将朝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在这条道路上会模仿、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制度与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模仿、借鉴、学习的结果，中国文化依然会是变其可变，而不变其不可变，绝不会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全盘西化，而在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全盘西化——即使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也是枉然。现在常有人设计中国的将来文化应该如何如何，或应该是中西文化互补，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立意虽然不错，无如中西文化并非两个泥人，可以打碎了和上水再重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变化规

律，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敢就说十分清楚，恐怕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述而不作，是著书不如抄书。自认述而不作的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倡著书不如抄书的是清代实学的开山祖，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大人物，但却都认为自己毫无创新，仅只沿袭成说而已。他们的思想或许表明了中国文化寓变于不变之中的特点。

当饭菜吃还是当衣服穿？

题目是俚俗了点，但非此似难以表达中日两国对于外来文化态度的差异。

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戊戌维新的失败已经困扰了几代中国人：何以人家一蹴而就，而我们底事无成？彼理的黑船一八五三年才打开日本国门，不过十五载维新已奏凯歌；一八四二年中国已开放五口通商，几乎过了一整个甲子，百日维新仍不免于流产。如果我们只从这两件事作比较，我们将永远不免于困惑。我们必须稍微扯远一点。

首先，通常所说的成功实际上是指现代化的成功，更直截了当地说是西方化的成功。就这点而言，我们至今尚未成功，遑论百年以前？其次，日本现代化或曰西化的成功并非仅明治一例，大化改新是更重要的另一例。而中国的西化，非但过去失败，今后也不会成功。原因不在别的，在于中日双方对待外来文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是把外来文化当饭菜来吃，而日本则把它当衣服来穿。当饭菜吃，要尝口味，要咀嚼，要下咽，要消化。尝了不好吃，就不吃，难以下咽就吐掉，消化不了就拉肚子。但

是如果好吃，如果易于消化，那就变成养分，变成自身的一部分。饭菜不见了，身体见长了。外来文化不见了，中国文化丰富了。但是这一过程很长很慢，绝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昔贤有言，佛教这顿饭我们吃了一千年。吃了以后怎么样呢？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禅宗。不是我们被西方极乐世界所同化，而是梵天圣教被中国化了。

日本西化则不同，那是衣着的模仿，只要谁穿着好看我也来它一件，很方便很简单。拿来就穿，不费思量，不存在消化得了还是消化不了的问题。穿着不合适，再换一件就是，反正衣服并非身体的一部分。日本历史上的两次全盘西化都是拿来就穿，而且刻意模仿，几可乱真。第一次西化远在一千三百年前，其时日本对于中国的文物典章无一不照搬如仪。中国自然是在日本的西边，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信就自称日出处天子，而称炀帝是日落处天子。至今您去参观日本水户市德川家的墓地，马上就能发现驮着石碑的大乌龟竟是一色的头朝西，表现出江户幕府对中国文化的极端仰慕。第一次西化由圣德太子发其端。他派出遣隋使节，聘来中土专家。采用中国历法，提倡儒家学说。建立新式政府，推行隋唐的官僚制度。紧接着又是闻名于世的大化改新，更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中国有什么，日本就引进什么。废除氏姓制度，划分行政区域，实行户籍登记，模仿租庸调制。甚至天皇之有年号，也从大化开始。弄到后来则连贞观年号也直接拿了去用，连端午、七夕、重九这样民族色彩极浓的节日也拿去照过不

误，唯一未引进的节日是中秋，那并非因为考虑到日本国情的不宜，而是唐朝人当时还不兴过中秋节（此点周一良先生有精辟的考证）！

大化改新当时那种学习上如饥似渴，力求惟妙惟肖的精神尚非上述数语所能概括。这里再举极端之一例说明之。今年元月二十五日《朝日新闻》登了一篇论文，解释藤原京为何短命的原因。公元六九四年，日本迁都于藤原京（在今奈良县橿原市），但是仅仅只过了十六年，藤原京便被放弃，而再度播迁于平城京。藤原京在当时是以计划的宏大而著称的，何以随随便便就不要了呢？据该文作者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对唐代首都长安城模仿得还不够像！整个藤原京是以长安城为模特设计的，但设计时正是日本与唐朝关系紧张的时候，对于长安大明宫等新建筑的情报无法得到，只能辗转从新罗获得有关信息。等到迁都以后十年，一批遣唐使从中国回来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由于大明宫的建成，唐朝已把国家的大礼与其他的仪式分别在太极殿与大明宫举行，而在藤原宫，太极殿与朝堂院却合而为一。这怎么行？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再建平城京，唯求与长安城毫无二致，而苦心建造的藤原京竟毅然弃于一旦——难怪今天中国学人对平城京、平安京都耳熟能详，而对短命的藤原京大多一无所知——在今天看来这一举动似乎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日本，国小民穷，完全用不着平城京那样规制宏伟的都城。然而这种样样盲目模仿的结果却是日本从